

● 李 庆 主编

# 迎接海洋世纪

—— 华夏与海

舟欲行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迎接海洋世纪

——华夏与海

李 庆 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东方蓝色梦.....    | 1  |
| 一、我们面临怎样一片蓝色..... | 1  |
| 二、海与人的共同选择.....   | 16 |
| 第二章 辉煌的航迹.....    | 27 |
| 一、传播文化的航船.....    | 28 |
| 二、灿烂的中国古代海洋学..... | 37 |
| 三、杰出的造船与航海技术..... | 50 |
| 第三章 深沉的反思.....    | 59 |
| 一、民族心理与海洋观念.....  | 60 |
| 二、经济思想与文明基调.....  | 68 |
| 三、退潮与涨潮.....      | 82 |

## 第一章 东方蓝色梦

在中国这世界的东方，在我们这块时时被太平洋的浪涛叩响的大陆上，华夏民族曾创造过辉煌的海洋文明。我们胼手胝足的祖先，在人类征服海洋的最初年代，激发大智慧、承受大艰辛、表现大勇毅，仰无愧于天，俯不作于地，为人类海洋文明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这支东方古国的蓝色船歌，应当让整个世界知道，应当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知道。

### 一、我们面临怎样一片蓝色

人们对历史的了解总是充塞着谬误。据报道：某高等院校在大学生中曾做过一次“国情”知识测验，99%的人认为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80%的人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祥地只有一个，它就在黄河的“腰部”。

事实上，这种惊人的谬误并非这一代人所独有。太平洋一些海岛的土著居民一直认为自己是从小月亮上下来的，因此他们对乘着双桅帆船而来的荷枪实弹的“地球人”，竟还表现出极度的轻蔑、怜悯和优越感。

无知和偏见妨碍我们接近真理。冯天瑜在《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中指出：“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地质的、气象的、水文的、人文的、生物的等等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创造文化的自然前提。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文化有声有色的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的悲喜剧，那么，各民族、各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和背景。”

中华民族是在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下，面对怎样的海洋创造自己的海洋文明的，这是人们在探讨中华民族海洋文明时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

### 沧海夫如何

晋代葛洪《神仙传·王远》中写道：麻姑与王远饮蔡经家。“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将复扬尘也’。”沧海桑田，海水成尘，蓬莱清浅。古代人对这种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解释，只是做为一种世事变迁、乾坤更迭的象征，以托寄对人事沧桑的茫然。他们唱道“沧海几近尘劫坏，江水独恨酒肠干（元好问）”；“蓬莱暂近别，海水遂成尘

（庾信）”；“适从海上回，蓬莱又清浅（苏轼）”；“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李贺）”。

然而，这种沧海桑田并不是神话。每到冰川期悄悄来到时，干燥寒冷的气候一次次袭击着大陆，大地上冰层厚厚，寒风凛冽，草木僵死，古生物啼饥号寒，成群、成种地死去。海水水量减少，海平面下降，过去只能遥望的海岛，一下子成为陆地上的山峰。而当冰川期结束时，暖湿气候来临，冰雪消融，万物一片生机，江河横溢，海水增长，水而增高，波涛向陆地浸陵漫延而来，当年的陆地又为蓝色的海水覆盖，高山艰难地露出头颅，成为浪花环绕的岛屿。在这整个过程中，海岸线时而向大海深处一退百里，时而又向大陆腹地漫卷而来，古人类也时而追逐退去的海水走向东，时而被冲来的洪波赶向西，如同一场顽强的“拉锯战”。

这种周期性的变化，人们经历了多次。

第四纪冰川期终于在距今 10000 年前后结束，海水最后一次漫向陆地，其极盛之时，现在的冀、鲁、苏、浙等靠近海洋的地区都被淹没，山东胶东半岛成为海岛，天津、连云港、南通、上海皆在水中，宁波还来形成陆地，德州、济南、扬州、无锡、苏州、嘉兴、绍兴这些今天的内陆平原城市或江南水乡秀镇，当时都在漫漫海波之畔。从这幅海陆分界图看，做为我们民族文化之源头的北京山顶洞人、山东大汶口人、浙江河姆渡人，都是傍河面海而居，听涛踏浪而生的。他们不但接近海洋，而且利用海

洋，从中取得鱼蚌而食，把美丽的蚌壳用棕绳串成项链珠串，挂在自己赤裸的身上。山顶洞遗址中就曾见到过这种装饰品。

《左传·庄公八年》中写道：“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这又是说的什么呢？原来，在公元前 786 年，齐襄公这个“言行无常，人莫知其所措”的君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来到了一个叫做姑棼的地方，在那儿，他见到了荒野上有大堆的贝壳。这些堆积如山的贝丘是古代人类把吃剩下的贝壳抛弃在居住地附近，积年累月而形成的。这种贝丘的遗址在辽宁、河北、山东都有发现。这说明当时这一带曾是濒海地区。

海洋这种不安分的举动，到大约公元前 6500 年前后才告消歇，中国海大致形成了今天的形状。在我们今天的版图上，18000 公里的海岸线纵贯南北，6000 多座岛屿星罗棋布，岛屿的岸线总长达 14000 公里。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海洋国土面积约 300 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1.2 个加勒比海，1.3 个地中海、20 个爱琴海、25 个亚得里亚海。

在这广大的海洋上，中华先民最初的航海活动并不是到处可见的。由于古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低下，航海器具简陋，航行知识、技能贫乏，所以他们最初的航海一定是选择在海流平缓、海岸曲折，岛礁众多、环伺其侧的近岸海域进行的。这就是日本人茂在寅男在《世界航海史》中说的那种：“基本上是视界不脱离陆地的航行”——因为当

时的航海者担心会永远失去陆地。我国的历史学家发现，我国古代人类的航行恰恰是寻着这一规律进行的。如在山东、辽东半岛及其近岸岛屿、黄海沿岸、舟山群岛之间进行。以舟山群岛为例，它与大陆相距不远，不足100平方公里内竟有600—700个岛礁露出水面，岛礁之间跨度很小，所以像舟山这类海域是先民们航海的理想场所之一。随着社会生产力与航海能力的提高，中国航海者从局限于沿岸与邻近岛屿间的短短航行，逐渐过渡到较近距离的沿岸航行与跨越半岛之间的海峡横渡航行，最后发展到远离海岸的航行。

中国人面对的这片蓝色究竟适不适于海洋文明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略有不同。

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沿海岸线比较曲折，有渤海这样被陆地与海峡环绕的“陆间海”和诸多天然良港，平均水深较浅，沿海岛礁密布，通海湖泊江河众多。同时，中国海地处位置较佳，面向开阔的洋面，其中南海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是沟通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澳洲及中、南美的海上交通枢纽。此外，季风规律明显，海流走向清晰，便于开展古代航海技术条件下的航行活动。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具有优越的航海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并进而认为中国海洋地理适于产生优越的海洋文明。

如果单从航海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来看，这种说法是具有科学根据的。但如果把海洋文明产生的背景等多重因



素考虑进去，这种说法又显得不够。

一个民族是否产生高度发达的海洋文明，其所临海洋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是十分主要的因素，但还有一些因素不能忽略。比如：该民族濒海地区的文明发达程度、物产情况、在这个民族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生产方式、与该民族隔海相向或相邻国家的情况、较适于航海的海域与其所濒临的陆地提供的条件及种种因素之间的平衡等等，这些无一不影响着人类航海活动的发展，无一不影响着一个民族海洋文明的发达程度和基本特色的形成。我们可以埃及为例证，做为与希腊共有地中海的民族，埃及人却没有产生高度发达的海洋文明，可见航海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他条件的不同会使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态完全不同。因此，简单地说中国具有优越的航海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对分析海洋文明的诞生、发展和走向，是无益的。

因此，我们必须对海洋文明赖以生成的条件做较全面的研究。

### 回首望中原

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

创造海洋文明的，是从陆地走向海洋的人。

因此，濒海地区陆地的情况，为人类的文化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称地中海海洋文明产生地的地理环境为，“与海相连的海岸区域”。那是一

片森林茂密、农作物不适生长的土地。它对地中海人放弃农牧采集这人类古老的生存方式而选择海上生活提供了绝对的条件。

中国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首先，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有无尽的平原和起伏的丘陵，江河纵横，水量充沛，土地肥沃，适于发展农业生产。在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众多因素作用之下，中华民族的文明以农业为主的倾向日益明显。“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基调。黑格尔在论述历史的地理基础时指称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为“大江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这片地区的特点是：“土地肥沃，那里的居民经营农业，土地所有权和法律关系随之发展，农业生产四季有序的规律性造成墨守传统的习惯，伟大帝国便建立在居民的情性上”。

这就和埃及、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同样有创造伟大农业文明的条件。这种农业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确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农业的生产依赖土地的开垦与整治、水利的兴修使用、农作物种植方面的地区性经验的累积，这些都导致了人类的定居生活，造成较为追求稳定生活的民族精神内涵。因此，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海洋文明的发展就相对弱一些。

农业生产是促使人类定居生活的重要因素，农业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大量农产品，改变着人类的饮食结构，促进了人类的自身进化。在最初的时候，人类的航海活动都是以渔业为目的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渔业是做为农业

的补充经济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有理由认为人类的早期航海活动附属于早期农业生产，早期的海洋文明实际上都结胎、孕育于农业文明之中。所以，那种认为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对立、认为两者毫无关系、势同水火的想法是片面的。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民族完全或部分地脱离了农业，发展起以本民族的海洋经济（特别是海上贸易）为支柱的海洋文明，而有的民族则仍然以农业为自身文明的主体。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才不可避免的部分或整体地分化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究竟是属于海洋的还是属于内陆的，其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濒临海洋，也不在于是否曾经有过早期航海活动的经历，而在于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经济生活，还是以海上航运、海外贸易为主要的经济生活。而从现实情况看，任何一个民族又不可能仅有一种经济生活，常常是多种经济形式交互出现、同时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活决定着这一民族的基本的文明样式。

以中国为例，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作用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选择，作用于哲学、宗教、艺术、科学和伦理道德观念及至社会制度。农业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个基础上，虽然也有海洋文明的出现，但是它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封建社会走向衰亡，

那种在农业为主的大前提下，有限度地发展起来的海洋文明也必然陷于危机，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重新崛起必须依靠社会革命才能达到和完成。

回首看中原大陆的第二个需要我们注意的事实是：尽管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但与海岸相对应的内陆文明发展却不平衡。一般认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在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的中下游，也就是古代的中原之地。何新在《中国文化史新论》中说：“这块平原事实上处在一种近乎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在这块大平原的北部和西部，有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吕梁山脉、伏牛山和秦岭，以及属于大巴山脉的武当山。在南部则有大别山、武陵山、九嶷山、天目山、南岭和武夷山脉，直到南海。这些群山巨岭，从北、西、南三面如同屏障和墙垣一样包围环绕着中原。”

这是一幅极有特色的图景，它表明，中华民族文化发达地区如同一只簸箕，其北、西、南三面是高山所形成的“边缘墙”，敞口的一方朝向东方的海洋——但不是朝向中国海的全部，而只是朝向渤海、黄海和东海的中、北部。在这里，何新特别地指出：“华夏民族文明最早发达的中原地区，面临的只是渤海。”由此看来，中国的海岸线虽然纵贯南北，但能做为海洋文明发祥地的，应是是中华民族整体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连通的中国中、北部海域。在考古发现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结论的实际例证。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它给中国海洋文明未来的

发展带来了非同小可的影响。我们知道：渤海，在南、北两大半岛的钳制和庙岛群岛的横栏下，实际上是一个陆间海。这很象爱琴海的形状。但爱琴海的沿岸不属于一个民族，文明形态各不相同，这就为沿爱琴海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提供了相互交流的要求与动因。而渤海沿岸却为中华民族所共有，文明形态大体相近；陆路地坦衢通，自然的与人造的隔绝又少，所以渤海沿岸不像爱琴海沿岸那样，有海上交流的充分“理由”。

东海、黄海同样连接着中华民族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黄海濒临太平洋的一面没有可供开发利用的较大岛屿，中国沿海岛屿密集之地在东海的舟山——台湾一带。这种海岛分布的不平衡性，使得黄海、东海的航海活动集中于东海中、北部地区。而黄海、东海所濒内陆地域平缓、无高山巨壑之阻，文明形态相近，交通便利，政治上的统一多于分裂，人们并非只有通过海上航行才可南北交往。

中国南海在中国四海中面积最大，约为渤、黄、东海面积总和的 2.8 倍。但南海濒临的大陆，不是华夏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与我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遥相阻隔。所以南海地区的文化交往主要表现为该地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而不是通过航海活动向南海以外区域的传播。历史事实上，我们祖先在南海航行的最早记录大约是秦、汉代，而在渤海、黄海、东海之上，此时早已是帆影层层，航迹条条了。

回首看中原大陆的第三个需要我们注意的事实是物质资源方面的。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说法，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文明比较发达，渤海地区较适于航海活动。而恰恰是中原地区缺少造船所需的木材。中国航海学会编写的《中国航海史》中提到：“中原地区因受木材的限制，所造船舶的质量较比江南差，造船用材仅是就地所取的杨木或柳木，这种状况延至后世仍复如此。”书中还引用了《许国公奏议》的说法，即：“北方平原万里，素也不产松杉，其船不过杨柳木打造。江且难涉，况于航海。”这虽然是较晚近的材料，但历史上的确有过东南沿海地区造船能力超越中原地区的史实。可见中原地区虽不至于象埃及人那样以纸莎草制船，但航海活动乃至海洋文明的创造又岂能不受影响？

回首望中原，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面临着广大的海洋，但是，它的农业发达，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一直占主导地位，这虽为人类走向海洋提供了最初的条件，但在海洋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制约力量。另外，它的文明发展不平衡，海洋文明自身发展的条件和文明发达程度不同步。再有，它的文明发达的中原地区，缺少航海活动必需的资源，而文明不发达地区或文明程度虽然较高但与占统治地位的中原文化相异的地区偏偏具有丰富的物质资源。这说明中国海洋文明赖以产生的条件总是不够完备、不够理想，呈一种复杂的、矛盾重重、互相制约、抵消力量的状态。这些不能不影响中国海洋文明的性

质和发展前景。

有一种含有内在矛盾的理论——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中国海洋文明赖以产生的各种条件，一方面又不敢提出这些条件对中国海洋文明自身发展的阻碍作用。似乎对这些条件的否定，便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不敬。这显然是一种错误。如果从中国海洋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中国海洋文明赖以产生、发展的其它条件看，它的确比地中海地区复杂、困难得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我们的祖先恰恰在劣于地中海的环境下创建了不输于地中海地区的早期海洋文明，这更证明了中华民族坚毅、聪明、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这正如《国语》中说过的：“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

### 举目望瀛洲

中国海洋文明受自然条件和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和周边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环境有直接关系。

中国从地理位置上，与世界其它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明显地互相隔绝、彼此独立着。它与印度洋、地中海等地区之间隔着早期航海者难以跨越的漫漫航路，因此，实际上它是处在一种孤悬于太平洋西海岸的相对隔绝状态之下。必须指出：航海活动必须以有意义的目的地为终点，这样的航海活动才是有实际意义的。而中国古代的航海者举目海外，高度发达的文明地区不在其视野之内，能“望”见的，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国的地区。这一

点，即便是中国航海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后也依然如此。

沈光耀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中指出：“作为科学意义上的我国对外贸易还只能说是开始于秦代”。更早时期，中原地区与四周方国、汉族与夷族、大陆与海外，就有过商贸往来，但并不是真正有科学意义的对外贸易。我们知道：从陆路环境上看，由中原地区出发，向西、向北都可以找到其它民族并以其为贸易对象。那么向东方和南方的茫茫大海中寻觅如何呢？

东方，隔海是朝鲜和日本。据历史记载：商纣王的嫡亲伯父、商朝太子箕子，因不满纣王残暴的统治，曾弃官离朝，装疯为人奴仆，避于沿海一带。商亡后，箕子率5000之众乘筏从山东出发渡海到达朝鲜，在那儿，他发现了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华夏民族的古高丽人。据姜曰广《辘轳纪事》上讲，到明清时，朝鲜还有箕子的遗迹。他说：平壤“城以西自锦绣山蜿蜒迢递，伏而再起者，箕子衣冠所藏也。”登上平壤城附近的浮碧楼或练光亭，可以“望箕子区画并田处，遗迹犁然”。而这还不是中国人首次到朝鲜。《诗经·商颂·长发》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之句。说的是契的孙子相土，在海外发现并治理了一块土地。有人推测，相土建立海外领地的地方就是当时尚未开化的朝鲜。

与此同时，以朝鲜为跳板航行到日本，或从中国黄渤海绕过朝鲜半岛直达日本的记载也有所见。当时中国的航



海者还给处于石器时代的、过着原始渔猎生活的日本民族带去了水稻种植技术和冶金技术，从而使日本从缓慢发展的所谓“绳文式”文化向着使用金属器具、进行水稻种植的“弥生式”文化转变。

由中国到朝鲜和日本的航路，起于中国东部沿海北端，这正是中华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经过航行到达的朝鲜和日本却是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带。中国的航海者在战胜了远比地中海航海者遇到的大得多的风浪之后，却不能象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那样获得什么直接利益。而中国航海活动比较发达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或正在进入封建社会，这使中国航海者不可能象地中海航海者那样，从奴隶买卖中获取暴利。中国的航海者从事航海活动的结果只是把自己高度发达的文明单向地传输给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的异族人民，这种航海活动对航海者自身，无论是从追求商业利益还是从吸收文化上看，都无“厚利”可图。

南方，是南中国海周边的一些民族。南海东邻菲律宾、南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西端是印度支那半岛。南中国海濒临的中国南方地区，是距中国文化高度发达地区较远的地区。南海之外各民族的文明需要经过中国南方这一文明不够发达地区的传递，才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相会。而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其文明程度也比较低。《尚书·大传》中记载：商末，周文王被商纣王囚于“羑里”，为了使他受到较好的待遇并进而获释，周文王手下